

第一阅读

# “正史”写作的想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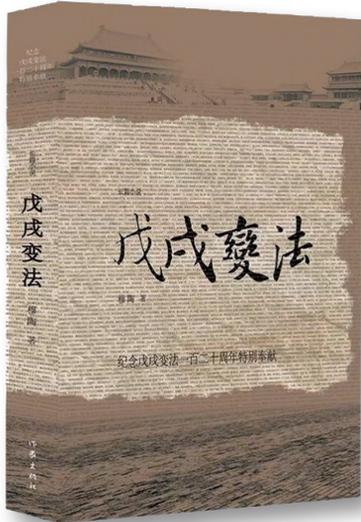
□汪荣

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历史书写”变得既简单又异常艰难。所谓简单，是因为宏大叙事已经解体，历史的严肃性被消解，娱乐化的历史书写大行其道。近些年的热门小说和电视剧所走的“戏说”路数，将历史前景的风云化作了后官的风月。在这种语境下，用“正史”的方法写历史小说反而变得艰难了。如何在历史的真实性与小说的虚构性之间保持平衡？如何使用新的历史观念来塑造历史人物和重绘历史事件？这些都是对历史小说创作者的巨大考验。

穆陶是一个对历史书写念兹在兹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由写明末清初社会嬗变的《红颜怨》开始，以及后来的《林则徐》《落日》《屈原》，始终在历史小说写作的田野中笔耕不辍，用当代人的视角去重述历史和还原历史，体现了一种历史现实主义的文学追求，受到了社会读者的广泛关注。他的长篇新作《戊戌变法》，历时8年完成，将目光转向了晚清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描摹那场探索中国出路的社会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

历史书写首先考验的是“史观”，即以何种立场和态度去评价和阐释既往的历史。小说家固然不是历史学者，但亦庶几近之。关于戊戌变法的意义，早先的历史学界多半认为是一场失败的改良主义革命，既没有改变封建制度，又不能救中国于危难之中。而晚近的历史学界已经对戊戌变法的若干问题有了新的判断和评价，例如将其视为一场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和近代中国一次比较完整的改革运动。在小说《戊戌变法》中，穆陶与晚近学界对戊戌变法的看法颇为相似。他认为，封建专制与君主立宪是不同的政治制度，戊戌变法有着社会变革的积极意义，不能忽视它的“文化启蒙”意义而仅仅看到戊戌变法改良的一面。

史观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创作中可以看出小说家的想象力。正是基于对戊戌变法的重新认识，穆陶塑造出了栩栩如生的戊戌变法人物群像。在《戊戌变法》中，无论是维新派的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还是洋务派的李鸿章、张之洞，甚至封建顽固派的慈禧太后等等，都写得有血有肉、饱满鲜活。穆陶用想象力唤回了历史的现场，把本来看起来抽象的历史变得日常化、细节化。在人物塑造方面，他拒绝符号化和脸谱化的写作，而是将人物置于具体的情景和状态中，从而为历史人物赋予了真实的人性和存在感。小说中，最出彩的毫无疑问是维新志士们，在谭嗣同、康有为、陈宝箴、徐致靖等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民族的“精气神”。这种“精气



神”中，既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之气，也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士人担当。这种勇往直前、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正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

《戊戌变法》写的是英雄气概，与之相得益彰的是小说家的“文势”。历史总是复杂丰富并且迷雾重重的。“正史”写作的难度在于：不仅需要在各种历史素材和历史事件中穿针引线，把零碎的、多样的材料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故事，还需要有一以贯之的“文势”，使整部小说自然流畅。《戊戌变法》格局庞大且人物众多，阅读起来却很少有磕绊之感，反而十分顺畅。这无疑得益于穆陶对材料的烂熟于心。正因为对历史的熟谙，他才能驱使文字如军队，挥洒自如，而又整饬严谨，如布战阵。

但是，阅读上的顺畅并不意味着叙事的简单。《戊戌变法》书写风云突变的晚清形势，各种人物轮番出场，各个派系的龙争虎斗，着实让人看得心惊胆战。穆陶的描写，在热闹喧哗的场景中，贯穿着一种历史的慨叹和忧伤，一种后设冷眼下的苍凉之感。《戊戌变法》的“楔子”写道：1926年凉风渐起的深秋京华，70岁的康有为在菜市场口泣不成语、号啕失声。随后，他留宿28年前住过的南海会馆“七树堂”。是夜，30多年前的火灾在康有为的脑海中冥冥入梦。随后的第一章，就将时间拉回到1888年的年轻的康有为那里，彼时的他正计划着要给皇帝上书，企图用自己的力量对政治进行改革。倒叙和回忆的使用，

使得这个故事有了历史的纵深，有了厚重的悲剧感。在时间线索的延展中，菜市场口上老年康有为的吟诵仿佛有了一种宿命的况味：“历维新梦，分明百梦中……”

是的，人梦和出梦，世事都如黄粱一梦。在“其后”的历史里，于后人看来，哪段历史不是一场春秋大梦呢？恰如评论者傅彩霞在《爱国主义的历史画卷》一文中所提及的，“在《戊戌变法》里，作者数次运用梦境诠释潜意识，起到了现实与虚幻的巧妙衔接。”穆陶用现实与梦境的无缝衔接去书写历史，在厚重的历史与人物的心理之间建起了桥梁，透过人物的梦将私人的经验和公共的历史连接起来。于是，看起来“重”的历史突然变得“轻”了起来。而这，正是穆陶历史书写的“美学”所在：一方面是厚重的、史诗的、现实主义的；另一方面却是轻盈的、细节的、象征主义的。穆陶用想象力重构历史材料的欲盖弥彰和语焉不详之处，将文学性与历史性有机缝合起来，从而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历史现实主义的书写文体。

具体说来，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穆陶有着自己的写作策略和文学探求，那就是“拟古”与“创新”的结合。他将传统的小说和历史书写的形式进行了现代转化。《戊戌变法》是当代小说，在楔子和尾声之外共有56章，采用的却是章回体，可谓古意盎然。在每章结尾处附上“镜史氏曰”的评论，既有追慕司马迁《史记》“太史公曰”传统的意味，又借重夫子自道对出场人物和写作手法进行点评，颇有自我暴露和自我解构的后设嫌疑。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穆陶在艺术手法上的“拟古”，也是一种稳扎稳打的现实主义历史书写风格。从穆陶的史诗化追求和文本细部的描摹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贯穿到历史写作中去的，采取的是“正面强攻”的正史写作策略，这就与写作市场上常见的娱乐化的戏说历史甚至架空历史的写作形式区别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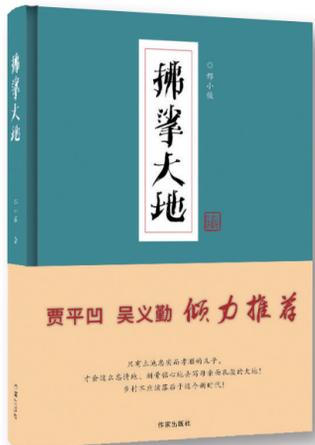
恰如《戊戌变法》的“题词”所言，“败贼成王，千秋功罪，尽付古今月旦评”。俱往矣，离戊戌变法的历史事件已经有120年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穆陶的长篇小说《戊戌变法》用正史的写法，用小说家的想象力带领读者重回了历史现场，重温了那段波谲云诡的晚清岁月。穆陶是带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去进行历史书写的。在他的笔下，历史中的英雄和伟人的身影没有远去，他们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拳拳之心，对“现代中国”前途命运的探索依然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品鉴

## 长篇纪实文学《拂掌大地》

# 让人们真切地听到时代的脚步声

□苟天林



与其兄柳公卓谦让墓地而得名，在当地实实在在存在着的。这里正是那小俊的家乡。为什么要选“让义村”，为什么在行文中既讲“让义”又讲“让礼”？“仁义礼智信”，这不正是我们中华文明、文化的“五德”吗？在“让”“礼”这个概念下，在今天的新时代，耀州的“好人现象”层出不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累累硕果。深厚的文化基因，耀州33万人民的传承演绎，在作者笔下表达得淋漓尽致。

浓烈的真情大义。什么是真情？什么是大义？我们看一看作者和书中所提到的乡亲们，怎样对待老人们讲的“古经”，怎样对待祖辈继承的“传统”，怎样对待“栽树”“修路”这些日常的生活，怎样对待我们脚下的那一块土地，就能感受到对国家、对家乡、对土地的那一种真情。在这样一个普通村庄里，人们从小到多大，乡村的“先生”是怎么搞教育的；外边来的客人是如何看待这个乡村的；而乡亲们又是怎样看待外边来的客人的；村头的一棵大树，

树上的那一个鸟窝，村里放药锅的那个地方和药锅的用法……这些都蕴含着真情、深情，都蕴含着为人之义、为家之德，都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真情和大义。

自觉地担当和责任。中华民族从《诗经》至今，不乏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习近平总书记说，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需要更多有见识、有担当、有智慧的文学家、艺术家；伟大的时代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必然会迎来文艺繁荣的春天。青年作家那小俊的实践和贡献有突出的示范意义。

陕西作家那小俊立足于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拂掌大地》。这本书，通过实实在在的乡村故事，通过家乡父老乡亲的亲历亲为，一点一滴地报告了中国农村摆脱困境，农民致富的消息。让人们真切生动地听到了时代的脚步声，看到了我们的父母和乡亲，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童年和今天。同时，也看到了我们民族的伟大和深厚，过去和未来；看到了中国乡村的可喜变化和光明前景，看到了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远意义。

我觉得这本书有四个鲜明特点。鲜明的时代精神。那小俊的《拂掌大地》，把舞台放在陕西的铜川耀州，把根子扎在他成长的、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让义村”“让礼村”。作者以时代的大视野看它的过去，看它的变化，看它的成果，看它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它不是说教，而是人人所有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是家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谋划，是人人能感受到的发展和变化。

在书中，新时代的各种成果，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事物，在这个村先后都出现了。群众的根本利益、民主权利得到了保障；电商出现了，医疗改革出现了，互联网出现了，青年人上大学、外出打工、回乡创业也出现了等等。这个普通乡镇、山坳村庄和时代、和国家、和民族的呼吸、命运、成长休戚与共、熔融为一体。

我国有2000多个县、40000多个乡镇。如果我们的作家、艺术家都能够这样深刻地去解剖其中的县，认识其中的乡镇，倾听它的呼吸，观察它的风采，明晰它的脉搏，以作家、艺术家特有的见识和才华去反映、去创作，那么，中国文化的繁荣兴盛就必然会出现。这正是我们所倡导的时代精神，是时代的呼唤和人民对优秀作品的期盼。

深厚的文化基因。那小俊在这本书里讲到了众所周知的事实：人类的四大古老文明，只有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传承至今；而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和根本，中华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给人类的昭示，不仅有丰厚的文献典籍，更生动更直接的是蕴涵在祖国的大地上，蕴涵在祖国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中，蕴涵在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灵和生活中。

作者在全书开始就讲到“天爷”。“天爷”是陕西关中老百姓平时对“天”的称呼。老百姓把天打雷叫“老天爷说话”，把天亮了叫“老天爷醒了”，把主持公道叫“老天爷在上”“老天爷看着”。我们就是在这样一块土地上生活。它是什么，它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在那小俊的这部书里，贯穿始终的一个基因，一条根脉，一个灵魂也是“天人合一”。

同时，这本书中的主要场所“让礼村”，就是陕西耀州的“让义村”，是以唐代书法家、太子太保柳公权

书斋札记

## 作家旧信中的人格

□郑午然

“手札”已经淡出我们的视野，它有过上千年往返不绝的辉煌，其独有的文化内蕴到今天已接近断层。如果我们不能轻易收到书信了，那么，就不妨观摩张瑞田《百礼馆三记》里的书信照片，以慰旧怀。张瑞田收藏众多当代作家书信，他的新著《百礼馆三记》中的“旧信记”一辑，钩沉往事，理性评鹭，并附有若干旧信手迹可供读者观摩。

“匡满同志：我已于一日顺利返回连队，仍住原来房间，现在是我一人独占了。房间几月未住人，推门一看，另有一番景象：蛛网尘封，白霉铺地，破纸堆里，跳出青蛙来迎。丁力帮我清扫，张小华帮我洗帐子，晒床板，叶勤帮晒被褥。我也花了两天打扫、清理、洗晒、归置，因此累倒，在床上躺了两天，却也体会到劳动改造世界的乐趣。如今虽然谈不上窗明几净，却也建立新秩序，可以为所欲为了……祝近好！顺致杨小敏、崔道怡、小周明同志好！光年73.6.18”这是1973年，诗人张光年从湖北咸宁干校寄给连队的年轻战友杨匡满一封信的节录。张瑞田对此有所闻发：“正如同张光年与杨匡满在‘文革’期间被边缘化一样，当代许多作家在利益集团的重组过程和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也被边缘化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鲜有人重复张光年对杨匡满的真挚倾诉。”老一代诗友之间的热忱，带有从前的特点，这也是书信擅长展示的特点。

“延滨同志：你代《重庆晚报》约稿的

信，早已收到，忙于杂务，稍复为歉。近日忆及童年时在重庆度过的那段岁月，已是半个世纪了，但有些印象仍深留在记忆中。写了一篇记趣的短文，不知合用否？请你看看。如尚合要求，请你代为寄去。如不适用，望勿为难，寄回给我即可，以后再写。勿此。即颂编绥。唐达成一九九七年元月二十四日”

这是20年前的一封信。其时唐达成已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任上卸职，已逾8年，而儒雅性情没有多少改变，接受约稿，态度谦逊平易之极。年轻读者看不出这位书信作者曾经身处高位。

“雷加同志：年老多病，气候变化，常感心脏不适。书还没有去邮局寄，却又住院了，要检查一段时间。只好等出院后再寄了。反正也不急，一非‘名著’，又无‘巨作’，留给老友们作一纪念而已。自幼喜爱文学，特梦想写长篇小说，但一直在文艺界‘打杂’，一无所有。‘文革’后才又开始写点散文，新时期以来，也仍是‘打杂’而已。勿此。祝好！陈荒煤十月十一日”

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封信。陈荒煤自谓“打杂”，与其他文学界前辈一道，共同领导并魅力维护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而生的一段文学繁荣时期，那是多少人追怀不已的黄金岁月。张瑞田的阐释，令人感慨系之。“程代照同志：你好！贵刊创办以来，一直迎着风浪前进，高举马克思主义

文艺大旗，抵制不正之风，令人十分佩服。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诗坛也是一个重灾区。至今尚未做认真的清理。而且还有人在打擦边球，这种朦胧诗选，那种朦胧诗赏析，照出不误，真怪事也。我儿子慨然写了一篇论新诗优良传统的文章，未点名批评某些人的观点。我看了一下，寄给你们审阅，看是否可用？如不行，可退还给他，提些意见，令其修改。祝编绥两安。丁力90.8.31”同一时期的这封信，显得别具一格。它是一封荐稿信，张瑞田称之为“举才不避亲”，结果怎样？张瑞田淡淡地说：“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在《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杂志发表，我也没有读到这篇立场坚定的文章。时间过去了二十八年，丁力先生，程代照先生也先后作古，我辈把朦胧诗当文学‘第一口奶’的文学青年，已人到中年。北鸟老了，顾城死了，‘80后’的读者把朦胧诗当成了文学遗产。可是，据了解，在书店中能卖出的诗集仅仅是北鸟、顾城、舒婷等人的作品了。似乎当下无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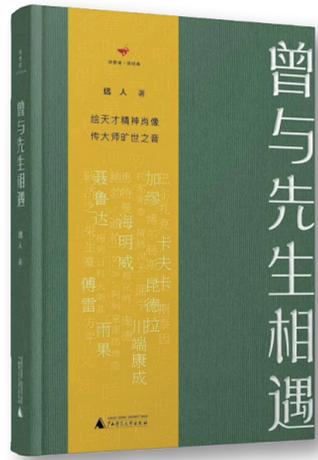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学界，还发生过一桩趣事。老资格的阳翰笙率团访日，行前带一些馈赠日本友人的礼品，归后将日本友人赠送的礼品带回家。这件事情被举报到文联党委，并由文联党委函呈报周扬和夏衍。但周扬、夏衍、阳翰笙有近半个世纪的交谊，年轻时间为大名鼎鼎的“四条汉子”，因此，周扬、夏衍只在公函上圈阅，不做批示。张瑞田写道：“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对外国商品所表现出的敏感和谦恭，一度让我们失去了尊严，即使现在，我们的心还隐隐作痛。”

《百礼馆三记》的“三记”是“读传记”、“旧信记”、“谈礼记”，基本是从手札中透视历史，在历史中看到人心，知人论世，展现了写作者的睿见卓识。雅人深致，不亦宜乎。

# 沉淀的学养与飞扬的才情

——读远人随笔集《曾与先生相遇》

□辛泊平



我喜欢远人的诗与随笔，是因为他的纯粹而又饱满的文字，因为他文字里沉淀的学养与飞扬的才情。读他的诗集《你交给我一个远方》，我读到了一个凝神谛听万物与自我的沉潜而又深情的灵魂歌者，读到了心灵的远方；读他的随笔集《曾与先生相遇》，我读出了一个常年沉浸于文字而不知倦怠的读书人，读出了饱满的生命感受。

是的，我喜欢这本书，喜欢这样的文字。这是一本谈论作家与作品的著作，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评和人物传记。它没有匠气十足的谋篇布局，没有屈居鳌头的理论构建。而是由印象开始，或分析文本内外的人物公案，或品味文学世界的意旨情趣，都是言之有物，意到笔随。它是一种谨慎的打量，也是一种自由的书写。在文字中，他与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相遇，与他们对话，与他们交流心得；在文字中，他与那些已走入经典的文字结缘，与它们如切如磋，与它们互融共生。

这是一场关于灵魂与审美的对话，平等的、开放的，但又是分寸的、谨慎的。无论是面对文学的泰斗，还是作品的高峰，远人始终坚持独立而又公允的阅读姿态，不为尊者讳，不因公论止。也正因如此，他才会钩沉托尔斯泰的情感纠葛，向世人呈现一个既有伟人博大情怀、又有普通人嫉妒心理的托翁形象；他才会抓住雨果《悲惨世界》里的一个疑点，尝试着触碰大师的写作原点，探究更为普遍的写作伦理……所以，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永远不会疲倦，因为，作者不仅是在对作品言说，在与大师对话，他的对话谱系里，也有读者。

这是一本有温度的书。它的温度不是来自作者的

话语方式，而是源自作者对历史与当下的关注与思考，源自作者对文学的虔诚与热爱。不论是赞美还是质疑，远人都不不是泛泛而谈，浅尝辄止，而是真诚地叩问，热烈地回应。他理解屠格涅夫的罗亭的“软弱”，喜欢巴尔扎克的欧也妮的纯美。他写《曾与先生相遇》，不仅写一个世界上的历史遭遇，还写出了老诗人拥抱生活、笑对人生的坦荡与胸怀；他写《世间再也无傅雷》，不仅表达了对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治学态度与操守的敬意，还表达了当下消费主义对文学衰败的不堪现状的愤慨与忧虑……所以，读这本书，你会不自觉地被远人深沉而又激烈的情绪感染，和他一起，在文学的历史与当下中穿越，感受着人世的悲欢，也感受着文字的光芒。

这是一本有品质的书。跟着远人的笔触，我们可以读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到博尔赫斯和卡夫卡，读到福克纳和海明威，读到川端康成和马尔克斯，读到一个个超越尘世的灵魂以及他们感应世界打开生命的方式；可以读到《呼啸山庄》和《城堡》，读到《第三河岸》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读到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生命历险和命运轮回。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猜想，一次阅读可以抵达的生命疆域，我们可以想象，一次对话可以完成的灵魂塑造。这是一本有故事的书。每一次阅读背后都藏着一个私人秘密，都弥漫着时光迷人的光泽。少年的偏执与青涩，青春的敏感与忧伤，中年的豁达与沉潜，老年的宽厚与慈悲，都可以在这些文字里找到合适的注脚。因为，这样的阅读不是瞬间的彩虹，它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为生命作证，为灵魂洗礼。